



● 上自隆古，下迄清代，尽抡四部精要。
● 孕群籍而抱万有，道旨与文采兼备，为今人国学入门之最善本。

毛泽东青年时代受影响最深的书

文白对照本

曾氏九本钞

编纂／〔清〕曾国藩
点校／〔清〕李鸿章



曾氏杂钞

曾国藩 / 编

[肆]

昆 仑 出 版 社

传志之属 上编三

杨胡朱梅云传 (汉书)

【题解】

本文是杨王孙、胡建、朱云、梅福、云敞的合传。班固一向以醇儒自居，不满过激言行，杨王孙坚持裸葬，胡建不畏强暴，梅福数言切谏，云敞舍死赴义，尤其是朱云，少喜游侠，老而隐居不仕，数人行事，多不与中庸之道合。原因何在？传末“赞”引孔子语“不得中行，则思狂狷”给出了答案。但还不仅止于此。两汉厚葬成风，为杨王孙立传，即委婉地表达了对这种风气的不满。胡建、云敞行事不同，为名则不异。朱云、梅福欲遏外戚专权，前者有狂气，后者嫌愚忠，皆不容于世。东汉外戚势盛，班固本人就依附外戚窦宪，文中借题发挥，可谓用心良苦！

【原文】

杨王孙者，孝武时人也，学黄、老之术，家业千金，厚自奉养生，亡所不致。及病且终，先令其子曰：“吾欲裸葬，以返吾真，必亡易吾意。死则为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，既下，从足引脱其囊，以身亲土。”其子欲默而不从，重废父命；欲从之，心又不忍，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。祁侯与王孙书曰：“王孙苦疾，仆迫从上祠雍，未得诣前。愿存精神，省思虑，进医药，厚自持。窃闻王孙先令裸葬，令死者亡知则已，若其有知，是戮尸地下，将裸见先人，窃为王孙不取也。且《孝经》曰：‘为之棺槨衣衾。’是亦圣人之遗制。何必区区独

守所闻？愿王孙察焉。”（以上祁侯书）

王孙报曰：“盖闻古之圣王，缘人情不忍其亲，故为制礼，今则越之。吾是以裸葬，将以矫世也。夫厚葬，诚亡益于死者，而俗人竞以相高，靡财单币，腐之地下。或乃今日入，而明日发，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？且夫此者，终生之化，而物之归者也。归者得至，化者得变，是物各反其真也。反真冥冥，亡形亡声，乃合道情。夫饰外以华众，厚葬以鬲真，使归者不得至，化者不得变，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且吾闻之：精神者，天之有也；形骸者，地之有也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之为言归也。其尸块然独处，岂有知哉？裹以币帛，鬲以棺槨，支体络束，口含玉石，欲化不得，郁为枯腊，千载之后，棺槨腐朽，乃得归土，就其真宅。由是言之，焉用久客？昔帝尧之葬也，窆木为椁，葛藟为絨，其穿下不乱泉，上不池殒。故圣王生易尚，死易葬也。不加功于亡用，不损财于亡谓。今费财厚葬，留归鬲至，死者不知，生者不得，是谓重惑。於戏，吾不为也！”祁侯曰：“善！”遂裸葬。（以上王孙答书）

胡建字子孟，河东人也。孝武天汉中，守军正丞，贫亡车马，常步与走卒起居，所以尉荐走卒，甚得其心。时监军御史为奸，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。建欲诛之，乃约其走卒曰：“我欲与公有所诛，吾言取之则取，斩之则斩。”于是当选士马日，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，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，拜谒，因上堂皇，走卒皆上。建指监御史曰：“取彼！”走卒前，曳下堂皇。建曰：“斩之！”遂斩御史。护军诸校皆愕惊，不知所以。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，遂上奏曰：“臣闻军法，立武以威众，诛恶以禁邪。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，私买卖以与士市，不立刚毅之心、勇猛之节，亡以帅先士大夫，尤失理不公。用文吏议，不至重法。《黄帝·李法》曰：‘壁垒已定，穿窬不由路，是谓奸人。奸人者杀！’臣谨按军法曰：‘正亡属将军，将军有罪以闻，二千石以下行法焉。’丞于用法疑，执事不谄上，臣谨以斩，昧死以闻。”制曰：“《司马法》曰：‘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。’何文吏也？三王或誓于军中，欲民先成其虑也；或誓于军门之外，欲民

先意以待事也；或将交刃而誓，致民志也。建又何疑焉？”（以上新监军御史）

建由是显名。后为渭城令，治甚有声。值昭帝幼，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，外人骄恣，怨故京兆尹樊福，使客射杀之。客臧公主庐，吏不敢捕。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，盖主闻之，与外人、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，奔射追吏，吏散走。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微伤主家奴，建报亡它坐。盖主怒，使人上书，告建“侵辱长公主，射甲舍门；知吏贼伤奴，辟报故不穷审。”大将军霍光寝其奏。后光病，上官氏代听事，下吏捕建，建自杀。吏民称冤，至今渭城立其祠。（以上为渭城令冤死）

朱云字游，鲁人也，徙平陵。少时通轻侠，借客报仇。长八尺馀，容貌甚壮，以勇力闻。年四十，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《易》，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《论语》，皆能传其业。好倜傥大节，当世以是高之。元帝时，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，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，言：“治道在于得贤，御史之官，宰相之副，九卿之右，不可不选。平陵朱云，兼资文武，忠正有智略，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，以尽其能。”上乃下其事，问公卿。太子少傅匡衡对，以为：“大臣者，国家之股肱，万姓所瞻仰，明王所慎择也。传曰：‘下轻其上爵，贱人图柄臣，则国家摇动，而民不静矣。’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，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，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。自尧之用舜，文王于太公，犹试然后爵之，又况朱云者乎？云素好勇，数犯法亡命，受《易》颇有师道，其行义未有以异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，经术通明，有伯夷、史鱼之风，海内莫不闻知。而嘉猥称云，欲令为御史大夫，妄相称举，疑有奸心。渐不可长，宜下有司案验，以明好恶。”嘉竟坐之。（以上嘉荐云为御史大夫）

是时，少府五鹿充宗贵幸，为梁丘《易》。自宣帝时善梁氏说，元帝好之，欲考其异同，令充宗与诸《易》家论。充宗乘贵辩口，诸儒莫能与抗，皆称疾不敢会。有荐云者，召入，摄褰登堂，抗首而请，音动左右。既论难，连拄五鹿君。故诸儒为之语曰：“五鹿岳岳，

朱云折其角。”由是为博士。(以上说经折五鹿)

迁杜陵令，坐故纵亡命。会赦，举方正，为槐里令。时中书令石显用事，与充宗为党，百僚畏之。唯御史中丞陈咸，年少抗节，不附显等，而与云相结。云数上疏，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，亡能往来，而咸数毁石显。久之，有司考云，疑风吏杀人。群臣朝见，上向丞相以云治行。丞相玄成言：“云暴虐亡状。”时陈咸在前，闻之，以语云。云上书自讼，咸为定奏草，求下御史中丞。事下丞相，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。云亡入长安，复与咸计议。丞相具发其事，奏：“咸宿卫执法之臣，幸得进见，漏泄所闻，以私语云，为定奏草，欲令自下治，后知云亡命罪人，而与交通，云以故不得。”上于是下咸、云狱，减死为城旦。咸、云遂废锢，终元帝世。(以上与陈咸俱废)

至成帝时，故丞相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，甚尊重。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，云曰：“今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亡以益民，皆尸位素餐，孔子所谓‘鄙夫不可与事君’，‘苟患失之，亡所不至’者也。臣愿赐尚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，以厉其餘。”上问：“谁也？”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，曰：“小臣居下讪上，廷辱师傅，罪死不赦！”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槛，槛折。云呼曰：“臣得下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，足矣！未知圣朝何如耳？”御史遂将云去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，叩头殿下，曰：“此臣素著狂直于世，使其言是，不可诛；其言非，固当容之。臣敢以死争。”庆忌叩头流血，上意解，然后得已。及后当治槛，上曰：“勿易！因而辑之，以旌直臣。”(以上廷辱张禹)

云自是之后不复仕。常居鄠田，时出乘牛车，从诸生，所过皆敬事焉。薛宣为丞相，云往见之。宣备宾主礼，因留云宿，从容谓云曰：“在田野亡事，且留我东阁，可以观四方奇士。”云曰：“小生乃欲相吏邪？”宣不敢复言。其教授，择诸生，然后为弟子。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，字仲，能传云学，皆为博士。望至泰山太守。云年七十餘，终于家。病不呼医饮药。遗言以身服敛，棺周于身，土周于椁，为丈五坟，葬平陵东郭外。

梅福字子真，九江寿春人也。少学长安，明《尚书》、《谷梁春秋》，为郡文学，补南昌尉。后去官归寿春。数因县道上言变事，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，辄报罢。是时，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，凤专势擅朝，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，讥刺凤，为凤所诛。王氏浸盛，灾异数见，群下莫敢正言。福复上书曰：“臣闻箕子佯狂于殷，而为周陈《洪范》；叔孙通遁秦归汉，制作仪品。夫叔孙先非不忠也，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，不可为言也。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从谏若转圜，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。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，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。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，争进奇异，知者竭其策，愚者尽其虑，勇士极其节，怯夫勉其死。合天下之知，并天下之威，是以举秦如鸿毛，取楚若拾遗，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。孝文皇帝起于代谷，非有周、召之师，伊、吕之佐也，循高祖之法，加以恭俭，当此之时，天下几乎。由是言之，循高祖之法则治，不循则乱。何者？秦为亡道，削仲尼之迹，灭周公之轨，坏井田，除五等，礼废乐崩，王道不通，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。孝武皇帝好忠谏，说至言，出爵不待廉茂，庆赐不须显功。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，以赴阙廷，自炫鬻者不可胜数。汉家得贤，于此为盛！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，升平可致。于是积尸暴骨，快心胡、越，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。所以计虑不成，而谋议泄者，以众贤聚于本朝，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。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，见间而起者，蜀郡是也。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，蹈藉名都大郡，求党与，索随和，而亡逃匿之意。此皆轻重大臣，亡所畏忌，国家之权轻，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。士者，国之重器，得士则重，失士则轻。《诗》云：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庙堂之议，非草茅所当言也。臣诚恐身涂野草，尸并卒伍，故数上书求见，辄报罢。臣闻齐桓之时，有以九九见者，桓公不逆，欲以致大也。今臣所言，非特九九也，陛下距臣者三矣，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。昔秦武王好力，任鄙叩关自鬻；繆公行伯，由余归德。今欲致天下之士，民有上书求见者，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，言可采取者，秩以升斗之禄，赐以一束之帛。若此，则天下之士发愤懣，吐忠言，嘉谋日闻于上，天下条贯，国家表里，烂然可睹矣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士民

之数，能言之类至众多也；然其俊杰指世陈政，言成文章，质之先圣而不缪，施之当世合时务，若此者，亦亡几人。故爵禄束帛者，天下之底石，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。孔子曰：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’至秦则不然，张诽谤之罔，以为汉驱除，倒持泰阿，授楚其柄。故诚能勿失其柄，天下虽有不顺，莫敢触其锋，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，为汉世宗也。今不循伯者之道，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世之士，犹察伯乐之图，求骐驎于市，而不可得，亦已明矣。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，晋文召天王，齐桓用其讎，有益于时，不顾逆顺，此所谓伯道者也。一色成体谓之醇，白黑杂合谓之驳。欲以承平之法，治暴秦之绪，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。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，又加戮焉。夫戢鹵遭害，则仁鸟增逝；愚者蒙戮，则知士深退。间者愚民上疏，多触不急之法，或下廷尉，而死者众。自阳朔以来，天下以言为讳，朝廷尤甚。群臣皆承顺上指，莫有执正。何以明其然也？取民所上书，陛下之所善，试下之廷尉，廷尉必曰：‘非所宜言，大不敬！’以此卜之，一矣。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，敢面引廷争，孝元皇帝擢之，以厉具臣而矫曲朝。及至陛下，戮及妻子。且恶恶止其身，王章非有反畔之辜，而殃及家。折直士之节，结谏臣之舌，群臣皆知其非，然不敢争。天下以言为戒，最国家之大患也。愿陛下循高祖之轨，杜亡秦之路，数御《十月》之歌，留意《亡逸》之戒，除不急之法，下亡讳之诏，博览兼听，谋及疏贱，令深者不隐，远者不塞，所谓‘辟四门，明四目’也。且不急之法，诽谤之微者也。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。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，外威之权日益隆，陛下不见其形，愿察其景。建始以来，日食地震，以卒言之，三倍春秋，水灾亡与比数，阴盛阳微，金铁为飞。此何景也？汉兴以来，社稷三危。吕、霍、上官，皆母后之家也。亲亲之道，全之为右，当与之贤师良傅，教以忠孝之道。今乃尊宠其位，授以魁柄，使之骄逆，至于夷灭，此失亲亲之大者也。自霍光之贤，不能为子孙虑，故权臣易世则危。《书》曰：‘毋若火，始庸庸。’势陵于君，权隆于主，然后防之，亦亡及已。”（以上疏请进贤求言，讥切王氏）

上遂不纳。成帝久亡继嗣，福以为宜建三统，封孔子之世以为殷

后，复上书曰：“臣闻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政者，职也。位卑而言高者，罪也。越职触罪，危言世患，虽伏质横分，臣之愿也。守职不言，没齿身全，死之日，尸未腐而名灭，虽有景公之位，伏历千驷，臣不贪也。故愿壹登文石之陛，涉赤墀之途，当户牖之法坐，尽平生之愚虑。亡益于时，有遗于世。此臣寝所以不安，食所以忘味也，愿陛下深省臣言。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，壅人所以自塞也。善恶之报，各如其事。昔者秦灭二周，夷六国，隐士不显，佚民不举，绝三统，灭天道，是以身危子杀，厥孙不嗣。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。故武王克殷，未下车，存五帝之后，封殷于宋，绍夏于杞，明著三统，示不独有也。是以姬姓半天下，迁庙之主，流出于户。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。今成汤不祀，殷人亡后，陛下继嗣久微，殆为此也。《春秋经》曰：‘宋杀其大夫。’《谷梁传》曰：‘其不称名姓，以其在祖位，莫之也！’此言孔子故殷后也，虽不正统，封其子孙以为殷后，礼亦宜之。何者？诸侯夺宗，圣庶夺嫡，《传》曰‘贤者子孙宜有土’，而况圣人，又殷之后哉？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，而皇天动威，雷风著灾。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，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，非皇天之意也。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，以封其子孙，则国家必获其福，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。何者？追圣人素功，封其子孙，未有法也，后圣必以为则。不灭之名，可不勉哉？”（以上疏请封仲尼子孙）

福孤远，又讥切王氏，故终不见纳。武帝时，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。至元帝时，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，位次诸侯王。使诸大夫、博士求殷后，分散为十馀姓，郡国往往得其大家，推求子孙，绝不能纪。时匡衡议，以为“王者存二王后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。其犯诛绝之罪者绝，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，上承其王者之始祖。《春秋》之义：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。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，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，而上承汤统，非当继宋之绝侯也，宜明得殷后而已。今之故宋，推求其嫡，久远不可得；虽得其嫡，嫡之先已绝，不当得立。《礼记》孔子曰：‘丘，殷人也。’先师所共传，宜以孔子世为汤后。”上以其语不经，遂见寝。至成帝时，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。绥和元年，立二王后，推迹古文，以《左氏》、《谷

梁》、《世本》、《礼记》相明，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，语在《成纪》。（以上终叙汉封仲尼子孙为殷后之事）

是时，福居家，常以读书养性为事。至元始中，王莽专政，福一朝弃妻子，去九江，至今传以为仙。其后，人有见福于会稽者，变名姓，为吴市门卒云。

云敞字幼孺，平陵人也。师事同县吴章，章治《尚书经》，为博士。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，年幼。莽秉政，自号安汉公。以平帝为成帝后，不得顾私亲，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，不得至京师。莽长子宇，非莽鬲绝卫氏，恐帝长大后见怨。宇与吴章谋，夜以血涂莽门，若鬼神之戒，冀以惧莽。章欲因对其咎。事发觉，莽杀宇，诛灭卫氏，谋所联及，死者百余人。章坐要斩，磔尸东市门。初，章为当世名儒，教授尤盛，弟子千余人。莽以为恶人党，皆当禁锢，不得仕宦，门人尽更名他师。敞时为大司徒掾，自劾吴章弟子，收抱章尸归，棺敛葬之，京师称焉。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，比之栾布，表奏以为掾，荐为中郎谏大夫。莽篡位，王舜为太师，复荐敞可辅职，以病免。唐林言敞可典郡，擢为鲁郡大尹。更始时，安车征敞为御史大夫，复病勉去，卒于家。

赞曰：昔仲尼称不得中行，则思狂狷。观杨王孙之志，贤于秦始皇远矣。世称朱云，多过其实，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亡是也。”胡建临敌敢断，武昭于外，斩伐奸隙，军旅不队。梅福之辞，合于《大雅》，虽无老成，尚有典刑，殷监不远，夏后所闻。遂从所好，全性市门。云敞之义，著于吴章，为仁由己，再入大府，清则濯缨，何远之有？

【译文】

杨王孙，汉武帝时人。学习黄老之术，家有千金，奉养生贵己之道，无所不得，在他病危临终之际，要求他的儿子说：“我要裸葬，以便返朴归真，你一定不要改变我的决定。在我死后要用布囊盛殓尸首，埋入地下七尺深的地方。把尸体放下去以后，再从脚开始脱掉布

囊，使身体完全接触泥土。”他儿子本想暗中不从，却又怕违背父命，可如果顺从了父亲的意思，心里又不忍，于是就去拜见杨王孙的朋友祁侯。祁侯就给王孙写信劝道：“王孙你得病受苦，我因为跟随主上去雍郊祠，所以没来得及前来探望，希望你能保存精力，尽量减少思虑，多进医药，多多保重，好自为之。我听说你已先要求裸葬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死去的人没有知觉就罢了，假使他们有知觉，你暴尸于地下，赤裸着去会见先人，我认为那就不可取了。况且《孝经》里也说过：‘要为死者着衣盛殓。’可见这也是圣人遗制，你又何必坚守黄老之术而不省孝悌之意呢？望你能仔细思量。”

王孙回信答道：“我听说古代的圣王，是由于人情上不忍看到自己的亲人受苦，才制订礼仪的，可今天的人们却忽视了这一点。我之所以要裸葬，就是为了矫正这种世风。厚葬本无益于死者，又使俗人们互相攀比，白白浪费财物于地下，其中更有今日埋下去明日就被盗掘的，这又与暴尸于野有什么区别？况且人死以后，都化归于物。使该返回本来的都返回本来，使该变化的都发生变化，这正是万物各返其真的道理。返回本真之后，无形无声，与道同体。而那些哗众取宠，主张厚葬的人，则使归者不得归，化者不得变，与它们的本真相殊隔，就会使万物各失其所。再者，据我所知，精神是为天所有的，肉身是为地所有的，精神脱离身体，回归他们的本来，因此才被叫做鬼，鬼即归的意思。离弃的尸身哪有知觉？如果再用布帛厚厚裹裹，用棺槨重重隔开，肢体再被紧紧捆缚，嘴里含上玉石，想变化也变化不成，慢慢地腐坏成一堆枯骨，等到千载之后棺木朽烂了，才能回归泥土，返回其本来的居所。依此来看，厚葬有何必要！过去帝尧的葬仪，也只是以空心的树干为棺材，用葛藤来捆束尸身，而且也并不深埋，只要不泄腐气即可。因此看来，圣王不仅活着的时候节俭，死时也比较简单朴素，从不在无用的事情上下功夫，也不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财物。今天的人们费财厚葬，不仅与自然之道相悖，而且这种做法死者既不知道，生者也无所收获，这才是双重的糊涂呢！唉，我可不这样做。”

祁侯说：“好！”于是就裸葬了。

胡建字子孟，河东人。汉武帝天汉年间，曾试用任职于南北军中为军中正丞。因为穷，买不起车马，故而常常步行，与士卒一同生活，所以与士卒们交情很深。当时的监军御史是奸滑之人。打穿了北军的围墙作为做生意的门户。胡建心中不满就想除掉他。于是邀约诸走卒，说：“我想约你们一起去杀一个人，你们要听我号令，我若喊拿下你们就将其拿下，我若喊斩你们就将其斩首。”于是在选士马的那天，当监御史和护军诸校列坐在办事的大厅时，胡建就从士卒队伍中走出来，佯作上前拜见，然后趁机跃上大厅，众士卒随后跟上，胡建指着监御史厉声道：“拿下他！”众士卒一拥而上将其拽下大厅。胡建紧接着下令：“斩！”士卒随即将其斩首。护军诸校一时慌作一团，不知何故。胡建这时已经写好奏折揣在怀中，即刻上奏朝廷道：“据臣所知，军法的设置，是为了树立武功以威服四众，铲除奸恶以严禁异端。现在监御史公开凿穿军营的围墙，与商贾勾结以谋取私利，不树立刚毅之心，勇猛之节，不身先士卒，更失理不公。只用文吏的议论，不能树立军法的威严。《黄帝·李法》说：‘壁垒如果修好，穿墙为门以为路的，都是奸人。奸人则该诛杀。’臣谨据军法所说：‘军正不属将军，将军若有罪，二千石以下的官也可以执法。’至于军丞是否有权执法，臣尚有疑，然而臣敢做敢当，绝不推上诿下，冒死听凭主上的发落。”皇上下诏道：“《司马兵法》说：‘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’，说什么文吏呢！三王在军中誓师，是想先统一民众的思想；誓师于军门之外，是想民众先有思想准备去做某事；有时还刀枪林立而誓，是为了使民众树立坚强的意志，胡建你又有什么怀疑的呢！”

胡建由于这事，声名大显。后来，胡建作了渭城令，很有政绩，在百姓中声望很高。当时正值昭帝年幼，皇后的父亲上官安将军同昭帝姐盖主的情夫丁外人关系甚好。丁外人这个人为人骄横霸道，因为与京兆尹樊丰有怨隙而结仇，就指使刺客射杀了他，并将刺客藏匿在公主宅中，捕吏不敢搜捕。渭城令胡建却率吏卒前去围捕。盖公主闻讯，就伙同丁外人、上官将军领着许多家奴仆客出去，打散了捕吏。公主还命仆射上奏弹劾渭城令，告其部下游徼打伤公主家奴。胡建上

表申辩，否认了这条罪状。盖主大怒，又遣人上书告发胡建“侵辱长公主，箭射公主宅门，知道吏卒打伤公主家奴，却避开不报，因而没有最后审理”。大将军霍光压下了这个奏折。后来霍光得了病，上官安代其管理朝政，命令吏卒前去捕拿胡建，胡建遂自杀。百姓都认为胡建含冤，到现在渭城还立祠纪念他。

朱云字游，本是鲁人，后迁至平陵。年轻时侠义有豪气，曾助客报仇。身高八尺有余，容貌壮硕魁伟，素以勇力被人称道。四十岁的时候，却一改往日的作为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《易》，又向前将军萧望之学习《论语》，都能继承他们的事业。朱云为人豪爽，不喜欢受拘束，当时的人们也因此推重他。元帝时，琅邪人贡禹做了御史大夫，华阴县丞嘉上书议论此事，说：“国家的治理全赖贤人相助，御史这个官职，是宰相的助手，位居九卿之上，因此更不能不仔细选拔。平陵人朱云，文武兼备，为人忠正，且有谋略，可以先让他拿六百石的薪俸试着执掌御史大夫的职责，以尽其才。”皇上就把这件事交给公卿大臣们去讨论，想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太子少傅匡衡说道：“大臣是国家的臂膀，为万民所敬仰，圣明的君王本该谨慎择选。《传》曾说：‘属下如果轻慢他的上司，地位低贱的人如果图谋权柄，那样的话，国家统治的基础就会动摇，百姓就不能安居。’现在嘉以守丞之官而图谋大臣之位，想让一个普通百姓一下子超过九卿，这决不是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。当年尧起用舜，文王选中太公，仍然要在试用之后才委以重任，又何况朱云呢？我听说朱云此人向来好勇，曾多次违犯国家法纪，虽然接受《易》学，很得师传，然而他的行事却没有丝毫改变。再说现在的御史大夫禹为人清廉，也很通晓经术，很有伯夷、史鱼当年的风范，四海之内无人不知，嘉却歪曲事实推举朱云，想让他做御史大夫，这明明是不负责任的荐举，恐怕包藏着奸心，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，应该让有司仔细调查清楚。”嘉竟然因此获罪。

此时，少府五鹿充宗深得皇上宠幸，传梁丘贺所传的《易》学。从宣帝时起朝廷就以梁氏《易》说为善，元帝也非常喜欢，想考辨梁

氏《易》与别家《易》说的异同，就命充宗同各位《易》家辩论。充宗仗着得宠的地位，诸儒都不敢与之抗衡，都谎称有病不去相见。这时有人推荐朱云，皇上于是将其召入。朱云整装登堂，抗首而请，音动左右。开始论难之后，连连挫败五鹿充宗，诸儒因而评说道：“长角五鹿，朱云折之。”因为此事，朱云作了博士。

后来，朱云改任杜陵令，因受牵连获罪，出走逃亡。正好遇到大赦天下，才又被举为方正，做了槐里令。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，与五鹿充宗结成一党，文武百官都很畏惧他们，只有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有气节，不攀附他们，却与朱云结交。朱云此时曾屡次上疏，弹劾丞相韦玄成只知保全自己，不去抵制石显等人。陈咸也多次诋毁石显。此后不久，朱云因被怀疑诱劝吏卒杀人而受到有司的考问。群臣朝见之际，皇上问丞相朱云以往的政绩，丞相韦玄成趁机诬蔑朱云为人暴虐无状。当时陈咸恰好在场，听了之后就转告了朱云。朱云于是上书自讼，陈咸又为他拟定奏章，请求批准交由御史中丞处理此案。然而此案最后却由丞相负责审理，丞相属下官吏准备定成杀人罪。朱云逃进长安，又与陈咸商量对策。丞相发现以后，就上疏朝廷：“陈咸本为执法大臣，有幸得以进见陛下，却失职泄漏机密，将内情透露给朱云，还为其拟定奏章，想把此案交由他自己处理。朱云逃亡之后，又与其私下联络，致使朱云至今未能服法。”皇上于是将陈咸、朱云一同下狱，减免死罪，服城旦之刑。陈咸、朱云终元帝一朝都遭禁锢而不得入仕。

成帝时，安昌侯张禹因是皇帝的老师而受封特进，很受尊重，朱云上书皇上请求接见，当时朝堂之上公卿大臣都站在一旁。朱云道：“现在朝廷大臣上不能扶助陛下，下不能有益于百姓，都是些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，正是孔子所谓‘粗鄙之人不能让他辅佐君王’。臣希望陛下能赐一柄尚方斩马剑，只要斩杀奸佞之臣一人就可儆戒其他人。”皇上问道：“要斩杀谁呢？”朱云答道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皇上大怒，道：“小臣居然敢处下犯上，朝堂之上岂能污辱朕的师傅，死罪不容赦！”御史过来拖朱云下去，朱云死死抓住殿前门槛不放，门槛也被折断。朱云大声呼道：“臣能与龙逢、比干同游于阴间，死也值

得！可不知朝廷会怎么样啊？”御史将朱云拖了下去。这时，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解开印绶，叩头殿下，说道：“朱云此人向来以耿直狂狷而闻名于世，假使他说得对，就不该杀；即使他说错了，也该原谅他。臣敢以死为其求情。”庆忌叩头直到流血，皇上的怒气才慢慢消解，然后这事才作罢。等到后来修门槛的时候，皇上说道：“不要换它！只修补就可以，以此来表彰耿直的谏臣。”

朱云从此之后再没有做过官，住在鄆县的乡间。经常乘牛车外出，有许多年轻学生跟随。所过之处，人们都很尊敬他。薛宣做宰相以后，朱云去见他，薛宣以宾主礼相待，顺便留朱云歇宿，不慌不忙地对朱云说：“你在乡间也无事，不如就留在相府东曹，也可以看看四方奇士。”朱云道：“你这新学后进难道也想要我做属吏吗？”薛宣就再不敢说什么了。朱云教学授徒，总是从众多学生中仔细选择传人弟子。九江人严望和他的兄长子元（字仲），都能传习朱云之学，后来都做了博士，严望还做到了泰山太守。朱云七十多岁时死在家中。生病之后也不请医生，也不吃药。留下遗言要求就用身穿的衣服装敛，棺材也只要能放得下尸身就可以，坟穴只要一丈五大小，仅仅放得下棺槨，死后葬在平陵东城之外。

梅福字子真，九江寿春人。年轻时游学于长安，精通《尚书》和《谷梁春秋》，做了郡文学，又补做南昌尉。后来弃官回到故乡寿春，屡次因治县之术上疏请求改革，希望能借乘使者所乘之车到皇上出行的驻地条对政事，却不被允准。当时成帝重用大将军王凤，王凤专权朝纲，京兆尹王章本性忠直，讥刺王凤，被王凤诛杀。王氏一族的势力逐渐强盛，这时灾异之兆已出现过几次，然而群臣没人敢站出来说话，梅福就上书道：“臣听说箕子在殷时装疯，却为周室献上了《洪范》篇，叔孙通逃秦归汉，为汉室制作仪礼。叔孙通并非不忠，箕子也并非背家叛亲，只是无从进言而已。过去高祖纳善从谏都很痛快，因此才有陈平这样的谋士，韩信这样的将领，天下贤士都愿意归附汉室，智者能尽其谋略，愚者也能为其殚精竭虑，勇士能为其死节，就连怯懦之人也肯效死力。这样才能集中起普天下的智慧，聚拢起普天

下的武力，这样攻取秦地才会像拿起鸿毛，消灭项羽就如同路边拾遗，这正是高祖无敌天下的原因。孝文皇帝以代王身份发迹于代谷，并没有周、召二公这样的明师，也没有伊尹、吕尚这样的贤相，只是遵循高祖的做法，再加上自己的恭谨节俭，才会在当时实现太平之世。由此看来，只有遵守高祖的做法天下才会安定，反之天下就乱了。为什么呢？暴秦无道，削除孔子的影响，毁坏周公所持的法轨，破除井田制，取消五等爵，礼乐废弛，五道不能施行。那些试图施行王道的人都不能成功。孝武皇帝喜欢忠心直谏说真话的人，对于这样的人，封爵用不着举孝廉，赐赏不必有显赫的功勋。因此之故，天下百姓之中有贤德的人赶到朝堂之上自荐于君王的不可胜数。汉室网罗贤人，以这个时期为最盛。假使孝武皇帝听取他们的谋利，那么升平之世即可获致。至于积尸暴骨，以战胜胡越为快，这是淮南王刘安趁隙起事造反的缘故。之所以计划不成功而使计谋泄露的原因，是因为众多贤人团聚在中央，封国大臣势力受损，不愿顺从的缘故，目前平民敢钻国家空子，寻机造反的，就数蜀郡了。另外山阳亡命徒苏令之流，攻城掠地，结党聚众，寻求随顺附和的人，而没有逃匿的想法，这都是因为不重用大臣，故而无所畏惧，中央权力削弱，匹夫才敢与争衡。士是国家栋梁，得之则国治，失之则国乱，《诗》云：‘贤士荟萃，文王才得以安定天下。’朝廷议论，本非草野之民所该参与的，然而，臣实在是担心死于战乱，葬身荒野，所以屡次上书请求陛下接见。但屡屡不被允准，臣听说齐桓公时有人曾以九九算法得以晋见，桓公之所以满足他们的愿望，是想成就大业。现在臣所进言何只是九九算法而已，可陛下却拒绝臣三次，这正是天下贤士不附于陛下的原因。过去秦王喜好武功，大力士任鄙入关自荐；秦穆公欲成霸业，戎人由余都能归心相助。今天若想网罗天下名士，那么民间有上书求见的，就该让他们来尚书台，听听他们的进言，如果可以采纳，就要赐以俸禄。若能如此，天下名士就会抒发心中不满，倾吐忠言，皇上每天都能听到良策，这样天下才会秩序井然，国家才会上下一心，政治才会清明。以四海之广，百姓之众，能进良言的人实在很多呵！然而其中敢于指摘当朝政治，并能言之有据，不违先王遗制，又能解决当

前实际问题，实在没有几个。因此那些能食君禄的人，才是国家的磨剑石，高祖就是用他们来治理天下的。孔子说：‘工匠若想做好一件事情，就先得准备好工具。’暴秦则不然，他们罗织诽谤之网。之所以会被汉室取代，正是因为他们如此逆天而行，好比倒提泰阿宝剑，这是授柄于人呵，因此，若能不失其柄，天下即使有什么问题，也无人敢出来捣乱，这正是孝武皇帝开疆拓土建立功勋的原因。现在陛下不守霸者之道，反而想用三代选举的办法来网罗当世的贤士，这如同按照伯乐所绘之图，去索求千里马于市井，自然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是很明白的道理。过去高祖不记陈平的过失而采纳他的计谋，晋文公召天王，齐桓公能用其仇敌管仲，都是因为有益当世，所以才能不顾自己对人的好恶，这才是霸者之道呵！正所谓体成一色叫做醇，白黑相杂叫做驳。今天陛下想用治理太平盛世的办法治理暴秦留下的国家，这如同以乡村饮酒礼管理军队。今天陛下不仅不采纳天下贤士的良言，反而加害于他们，就像人们常说的，载鸛鸟被杀，鸾凤就会躲开；愚者被害，智士就会退避。愚民上书多不能切中时弊，因此被打入狱中，冤死的人很多。自阳朔年间以来，天下人都害怕进言，在朝廷上尤其如此。群臣一味迎合陛下，没人敢坚持正确的意见。如何能够证实微臣的话呢？陛下可以取民间上书中认为比较好的，试着交给廷尉，廷尉一定会说：‘这不是他们应该说的话，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。’由此推测其他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已故京兆尹王章品性忠直，敢当廷与皇上争执，孝元皇帝却提拔他，来做示群臣矫正逢迎之风，可到陛下的手里，却连他的妻子老小都不放过，一同诛杀。讨厌自己不喜欢的人，也应该只限于他本人，王章又没有犯反叛朝廷的罪过，却全家遭殃，这实在是断直士的气节，堵谏臣的口舌，群臣都知道这样不对，却没人敢为之申辩，天下若都以多言为戒，可是国家最大的灾难呵！希望陛下能遵循高祖旧轨，防止重蹈暴秦灭亡的道路，多听听《十月》这首诗，留心留心《亡逸》这首诗，免除无用之法，颁布去除隐讳的诏书，多看多听，让韬晦很深的人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使僻处民间的人也能痛快地发表意见，这就是所谓‘打开四门，以致众贤，明视四方’的意思。‘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’，当前君主的权